

“千万财政投研发”是否“婴幼儿奶粉”之福？

■ 武洁 医生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科委获悉，由科委立项，市财政拨付给北京三元、1077.97万元即将到位，用于后者承担的“安全健康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研究与产业化”研发项目。据了解，政府为婴幼儿奶粉研发专门立项，并拨付大额资金，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首次。三元食品该项目的主持人表示，我国对母婴体质和营养需求等方面的研究存在很多空白，急需补上。（《北京青年报》5月5日）

婴幼儿奶粉，既关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更关乎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既然如此，财政在婴幼儿奶粉研发领域不吝投入，

要说无可挑剔。尤其是放在洋奶粉攻城略地，国内高端婴幼儿奶粉市场几乎被洋品牌侵蚀殆尽，国产婴幼儿奶粉市场占有率日渐式微的背景下，来自财政资金的“及时雨”，更是堪称雪中送炭。

不过，尽管财政投入婴幼儿奶粉的研发，看似体现了关爱与责任。但数额高达千万的财政资金，被拨付给企业作为研发经费，市长之手与市场之手，是否过于亲密。既然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财政资金的使用理应与市场保持必要的距离，巨额财政经费投给企业做研发，也就或多或少难逃越界嫌疑。

应当承认，财政投入研发，的确天经地义，同样也是国际惯例。各国政府在财政支

持研发方面，也向来是不吝投入。例如，美国历来高度重视财政科技投入，并采取各种措施保持其稳定增长趋势。美国政府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向也不只是政府研究机构、大学，也包括产业界。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比例，更是保持了逐年增长。不仅如此，由于产业界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一些重点研发项目更是不得不借力产业界的人才与平台，政府财政投入花落企业，在国外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财政研发投入似乎不必太过纠结并较真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投入研发可以不计成本和效率，更不意味着财政研发资金的投入与投向可以毫无约束。恰恰相

反，由于发现财政科技资金过多地投入应用研究和试验领域将会产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近年来，美国财政科技投入不断向基础研究倾斜，向产业界的研发投入则有所下降。虽然国内产业与科技发展的阶段与美国存在差异，但如何让财政投入研发更有效率和效益，却并不因此而有不同。

以这一标准来审视，婴幼儿奶粉这一市场竞争性产品，尽管研发项目内容除了奶粉研制，还包括对奶粉消费者的喂养效果、健康状况的持续跟踪调查，并非毫无基础研究意义，且有相关审计和考评机制。但对于婴幼儿奶粉企业而言，这本身也是提升其市场竞争力的内在需要，当财政为一家企业的产

品研发买单千万，是否合宜，又是否对其他竞争者不公，自然也就值得商榷。

不仅如此，对于企业而言，想在市场上获得千万利润，其难度自然可想而知，相形之下，善用政策利好，争取财政资金，则要求得轻松惬意，甚至得来全不费功夫。现实中，更是不乏上市公司的盈利，靠的正是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与投入。不语市场的财政投入研发，会否反而填了财务窟窿，或许绝非杞人忧天。

基于此，政府财政投入研发，这个当然可以有，但假如本该四两拨千斤的角色，却错位唱起了主角，甚至寄望于财政投入研发来打造所谓民族品牌，恐怕绝非婴幼儿奶粉之福。

工薪劳动者报酬“该涨”是共鸣更是焦虑

■ 朱四倍 教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14年春季报告)》指出，中国工薪劳动者劳动报酬增长相对于GDP增长来说比较缓慢，工薪劳动者工资水平确实到了该涨的时候，此外，与同等人力资本水平的其他人群比较，公务员工资处于较低水平。（中新网4月29日）

《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14年春季报告)》从平均货币工资水平和城镇单位雇员工资水平出发得出了“中国工薪劳动者劳动报酬增长相对于GDP增长来说比较缓慢”和“城镇单位职工的工资增长与GDP增长相比也是相对缓慢的”结论，这再次佐证了公众的感受——工资水平低、缺乏合理的增长机制作为保障，而在物价水平日益攀升的当下，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工薪劳动者工资水平确实到了该涨的时候，而且越是低收入群体的工资越应该上涨”的结论让公众产生了广泛的共鸣。

那么，这种“该涨”靠什么来实现呢？仅仅学理性的计算和学者的呼吁难以让“该涨”落地。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长明

显低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长，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常识告诉我们，分析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也是被大家比较认可的指标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是否过低，如果相对比重在不断降低，则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速度慢于GDP的增长速度，如果这种状态长期存在，就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失衡，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也是“该涨”的重要理由所在。

往深层次上说，中国工薪劳动者劳动报酬增长相对于GDP增长比较缓慢还是一个发展理念的问题，是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健康的问题。因为隐藏其后的事实是，我国居民分享到的经济发展成果太少，并且是越来越少，而政府，则分享的最多，并且呈递增趋势，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不是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模式。

总之，“中国工薪劳动者工资水平确实到了该涨的时候，而且越是低收入群体的工资越应该上涨”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因素作为支撑。当下的一个明显事实就

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经济增长的成果正在向资本家、政府和权力阶层过度倾斜。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也指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由此，也带给了公众严重的焦虑情绪。尽管种种迹象显示，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下降，资本所得占GDP比重上升的趋势今后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应认识到，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压榨职工而来。更有数据显示，中国四分之三以上的财富为少数当权者把持，经济增长或企业盈余来自寡头独占。正因为如此，“该涨”的落地需要多方的努力。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好发展理念问题，认识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性。同时，要制定劳动者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让推动经济发展的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不仅是保障劳动者权益，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而且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工薪劳动者报酬“该涨”是共鸣更是焦虑！

用监管之手“拔下”违规插座

■ 李英锋 律师

用劣质插座给电瓶车充电，山东一村庄十余家房屋被烧毁；长时间使用万能插座，辽宁一新装修的新房被烧得面目全非……我国近年来累计发生的火灾事故中，由于电源插座、开关及断路器短路等原因引发的火灾，位居各类火灾之首。对此，全国有37个省市的消协（消委会、消保委）在5月6日联合发布消费警示：非国标插座不安全，睁大双眼防风险。（5月7日《华西都市报》）

非国标插座也即违规插座——指万用孔插座和两芯插座，隐患无穷，危害如虎。然而，大多数消费者并不知道国家已明令禁止生产万用孔插座，不知道两芯插座严重违反国家标准，容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消费者的这种不知情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违规插座的市场生存空间，也增加了违规插座的危险系数。显然，各地消协等组织向消费者发布明确的消费警示是必要的，消费警示有助于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能够让消费者逐步形成对违规插座的市场反制力，从而挤压违规插座的市场生存空间。

但是，对于违规插座不能止于消费警示。监管部门必须承担起法定职责，净化插座市场秩序，“拔下”违规插座，给消费者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空间，不能把抵制违规插座的责任扔给消费者。其实，用监管之手“拔下”违规插座并非难事。根据职责分工，企业生产环节由质监部门负责监管，市场流通环节由工商部门负责监管，

而自2010年6月1日起，替代1997年版旧国标的国标《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GB2099.3-2008)》正式实施，新国标明确规定禁止生产万能孔插座和两芯插座。据此，质监部门从插座新国标实施之日起就应该卡住非国标插座的生产，从源头堵住非国标插座。各地质监部门对于辖区内的插座生产企业信息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如果质监部门能够宣传、巡查、追责到位，就能够有效遏制违规插座的生产。而销售插座的主要是电料市场、五金电料商店、摊位以及一些综合超市和网店，市场经营主体远没有食品店那么多，在一些地方，市场经营主体还相对集中，且非国标插座与国标插座的区别特别明显，让工商部门在日常监管中有清理违规插座的敏感性和履职意识，保持对违规插座的常态压力，那么，在市场流通环节也能够卡住违规插座。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当前，很多生产企业和销售者面对监管都抬出“违规插座系新国标实施前生产”这一理由，非常荒唐——插座新国标已实施近4年，原来的存货还没有消化完？这是非常低级的谎言，根本不符合常理，监管部门不用动脑筋就能够将其识破，并结合插座及包装材料新旧、生产日期等信息进一步戳穿谎言。

要从市场上彻底“拔下”违规插座，全面换上国标插座，插座生产经营者固然应该承担第一责任，消费者也应该承担监督责任，但监管责任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只有监管责任到位，发上力，才能保障生产经营者们的责任落到实处，才能让消费者的监督责任产生效力。

戏画闲言

“勾肩搭背”遭禁止

■ 吴之如·文并画

《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纪委发文明确规定，严禁领导干部与私企老板勾肩搭背。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表示，“勾肩搭背”只是一种形象表述，实际是严禁领导干部与私企老板之间关系过于密切，甚至有利益输送的行为。“并不是指具体的肢体动作，领导干部与私企老板的正常工作交往是可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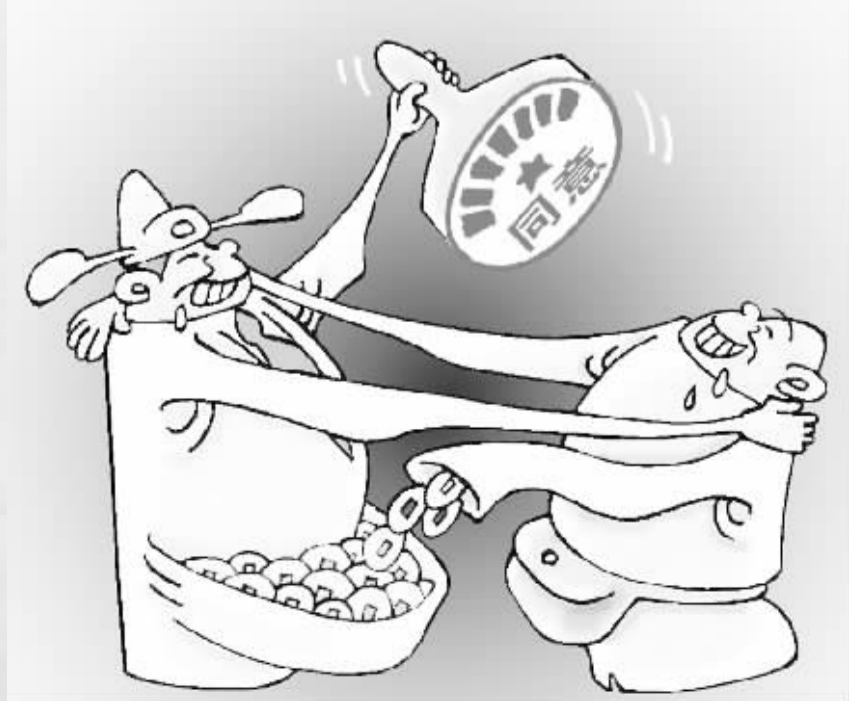
很明显，广州市纪委所说的“领导干部与私企老板勾肩搭背”现象，其实就是指指商官勾结，在暗箱操作中进行权钱交易。这类行为，与官场内部或明或暗的拉帮结派、买官卖官现象一样，都是老百姓深恶痛绝、同时也被党中央严禁禁止的最典型的腐败行为，在当下的反腐败斗争中，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理所当然。有道是：

勾肩搭背似一家，违法乱纪恶无涯；

权钱交易演腐败，理当严禁并彻查。

像广州市纪委那样，给各级领导干部定下十分严格而且严密的廉政行为规则，其目的正是遵照习总书记关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指示，打造堪称钢筋铁骨般坚固的制度笼子。制度一旦建立，就必须要求所有的公职都坚决遵守，不准任何人随意违犯，犹如自觉自愿地呆在“笼”中，而不逾矩以权谋私。这样的做法，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保证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像和声誉不被腐败所毁。否则，没有十分严密的廉政制度，缺少有效的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就等于没有管住权力的笼子，或虽有笼子却犹如烂稻草编成，想要从根本上遏制权力腐败也是做做表面文章，而不会有真正的效力。

因此，关注权力的笼子是不是很“铁”，这事非常重要。



“信用账号”护航社会诚信

■ 一叶 职员

据新华社电，我国即将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这表明我国公民每人即将拥有唯一的“信用账号”，这项举措使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新的阶段。（5月6日《新京报》）

长期以来，我国公民信用体系的建立长期因户籍地、行业差异并未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网，这导致相关部门的查处受到掣肘，一部分失信行为无法得到应有惩罚，当事人反而变本加厉、为所欲为。而此次“个人唯一”的信用账号的建立，有助于推动全国范围内诚信记录的联网共享，让失信者无处躲藏，让诚信蔚然成风。

在全国层面的诚信系统形成之前，部分行业已经开始构建全国范围内共享的系统。例如交通违章系统，由于早期交通违章系统是按省进行监管，一部分外地牌照车辆违章之后并不受影响，还可以正常申领驾

照。自2012年开始，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逐步实现跨省传递交通监控设备采集的违法记录，形成了覆盖全国、互联互通的系统，外地牌照车辆不再成为“特权车”。这次联网给司机敲响了警钟，对于整治全国交通违法行为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一大批“最牛违章车司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动辄几十、上百张的罚单让他们深感懊悔。可见实现信息的更大范围共享是何等重要。

不仅是交通违章系统违法，在金融贷款方面全国范围内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系统，一部分欠债不还的“老赖”在系统面前无处藏身，也再难从银行贷出款来。而此次“信用账号”的建立，不仅使得原有系统得到资源整合，在其他方面例如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方面也会实现资源数据在更大范围内共享，打破原来的地域限制，从国家层面保证综合信用平台的权威与透明。

不仅仅是公民个人信用将会更加透

明，政府、企业也在通过系统促进了各自的信息公开，使得原来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政府、企业的失信行为难以隐藏，同样也会因自己的失信行为受到相应惩罚。如此公民、企业、政府三者形成合力，各取所需、各有所查，加之法律体系的相应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将会有效发挥它的作用。

从长远来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国家制度完善的一项鲜明标志，欧美先进国家的信用体系对于规范公民的行为，促进社会诚信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公民由原本被动的约束转而为主动的服从。一次逃票经历甚至会影响未来的就业与贷款，一次小的失信行为会因此付出大的代价，这就是诚信的威力。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快速发展的社会，对于经济与财富的过度追逐，诚信成为了当下人们最亟待拥有的品质与道德。“信用账号”不仅仅是一个账号，更是一种警示、一种约束，它会成为诚信者的“荣誉证书”，也会成为失信者的“惩罚利器”。

铜陵全面“救市”之路能走多远

■ 江德斌

5月5日，安徽省铜陵市政府网站发布一则“《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解读”，宣布铜陵已经于5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的购房优惠政策。这是地方政府第一次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出台一个如此系统全面的救市政策，与此同时，其更直接突破了此前住建部等四部委关于公积金二套房贷首付不低于50%的规定，从而被称为“裸奔”救市。业内人士预期，救市潮“一定会被跟风”。（据5月6日《东方早报》）

铜陵市是全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为资源枯竭城市之一，总人口只有70多万，市区人口不足40万。在缺乏经济支撑、人口数量有限、购买力不足、住宅库存量高企等等制约下，铜陵市的全面“救市”之路能够走多远，着实要打个问号了。相比其他城市羞答答松绑楼市政策

的态度，铜陵市公开打出的全面“救市”第一枪，可谓明火执仗毫不设防，而且以突破公积金贷款利率的力度，直接挑战中央楼市调控政策底线，亦令人为之震惊。显然，地方政府已经耐不住楼市“遇冷”的寂寞，在土地财政下滑压力之下，冒险放手一搏，推行全面“救市”政策，试图拯救正陷入泥沼的楼市。

在铜陵之前，已有南宁、无锡等地或放松调控，或采取部分刺激举措，意在激活日渐冰冷的楼市。南宁是“松绑”限购，对北部湾经济区的几个城市户籍人口放开购房限制。无锡则是放宽购房落户条件，吸引非户籍人口前来购房，亦符合城镇化建设的要求。至于天津、杭州等地，虽然没有明文“救市”，但坊间已有相关传言，言之凿凿不可不信。不过，这些城市均为微刺激，“松绑”力度并不大，影响力也有限，而铜陵市却是以发布全面系统的“救市”文件，宣告地方政府甩掉“遮羞布”，开始堂而皇之地展开拯救楼市行动。

而且，虽然中央不再强调行政调控，要改走市场调节为主，但楼市调控政策并未废止，地方政府“踩红线”的做法，就明显属于违规行为，被紧急叫停的概率很大。而如果铜陵市的全面“救市”措施不被叫停，那么，其他城市势必会跟进，推出各自的“救市”措施，如此一来，号称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也将就此终结了。

不仅铜陵市急于摆脱楼市困境，纵观全国各地，除了部分一线城市外，大部分城市的楼市均呈现下滑迹象，三四线城市尤为明显。由于住宅兼具投资与居住功能，在楼市处于上升阶段之时，投资需求非常旺盛，亦成为房价走高的推手。但在楼市趋势改变之后，市场观望情绪就会占据上风，越跌越不买，从而逼房价继续下跌。可见，地方政府虽然充满“救市”的动力和冲动，但市场并不一定会买账，连李嘉诚都撤离内地楼市了，普通投资者还能不警惕吗？